郎朗谈梦想

郝思嘉 李叶

他被称作天才，13岁便获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年音乐家比赛第一名；他曾应美国总统乔治·布什邀请到白宫举行个人专场独奏会，成为第一位到白宫演出的中国钢琴家；他被《纽约时报》称为“古典音乐界中最闪亮的明星之一”；被美国《人物》杂志评为“最具魅力的男士”。6月14日，他以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的身份站上清华大学讲台，与学生们探讨“青年梦想”——

“如果有人因为我，而喜欢上钢琴，喜欢上音乐，并勇敢踏上追梦旅程，就是我梦想的一种实现。”6月14日，在清华大学学生们崇拜的目光里，郎朗慷慨陈词，神采飞扬。郎朗的口才不错，演讲大方沉稳，看得出，他早已习惯了受人瞩目的生活。

所有的辛酸都值了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流行“钢琴热”。两岁的郎朗音乐天分初露端倪，也得到了人生中第一架钢琴。那时的郎朗是沈阳的小名人，对钢琴兴趣盎然，全然没想到日后为钢琴做出的牺牲。

为了让儿子的天分得到发展，郎朗9岁时，父亲郎国任辞掉工作，陪郎朗进京备考中央音乐学院。来到陌生的北京，父子二人仅靠母亲定期寄来的微薄薪水艰难度日。郎朗的父亲很严苛，一心要帮助儿子圆钢琴梦。郎朗的童年用一本相册就可以全部容纳，册子里全是小男孩练琴的身影。后来，14岁的郎朗考入著名的美国科蒂斯音乐学院，并与国际著名的IMG演出经纪公司签约。2001年他签约了世界著名的德国DG唱片公司，现在一年在世界各国著名的音乐厅举办150场演奏会。

完成古典音乐界的大满贯之后，郎朗也同时完成了和全球顶级交响乐团专辑录制的合作。为了节省时间，总是在夜班飞机上完成睡眠的郎朗常会烦躁，但是只要演奏开始，音乐一出来，他的感觉就是，“Wow，值了！”内心的幸福指数直线飙升。学钢琴的路，有苦，也辛酸。但当那畅快享受的时候来了，曾经想要放弃的想法都变得愚蠢。

音乐对于现在的郎朗，则成为值得用全部热情和渴望去追求的事情。虽然他的工作日程已经排到了两年后，但在每个夏天他还是会把自己藏起来，离开城市，找一个环境好的地方，安心练琴。他弹莫扎特、巴赫、柴可夫斯基、贝多芬，还有肖邦、李斯特、巴托克，他说：“沉醉在音乐的时候你就变成了这个音乐。”他欣赏全面的演员，也努力成为一个自己心目中那种全面的钢琴家，没有边界的限制，像一个对各种角色驾轻就熟的演员一样，雕刻好自己的每一次演出。正因如此，每一次尝试过程里的辛酸，在演出时，都换来一句，“值了！”

一个有责任感的音乐家

钢琴不是一个平行的乐器，它有丰富的和弦，无数的可能性。郎朗不断地修炼自己，把自己变得更丰富，更立体，为自己音乐上更多的可能性积累力量。小时候他是莎士比亚迷，那时候念过的莎翁剧作，对他的节奏感有很神奇的帮助。现在的他，在读歌德的对话录，贝多芬的信件，莫扎特的日记，还研究与这些音乐家同时代的雕塑家、画家，通过对比之后，去发掘艺术更丰富深厚的肌理。在音乐上不断追求的同时，他也在自己的角色上，乐于去充当一个变革者，追求更多的可能性。“我相信现在我们所享受到的一切方便和美好，很多都来源于变革者的创造。”

在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之后，郎朗去了趟非洲，这经历让他的梦想开始转向，不仅仅只在于成为一个伟大的钢琴家，更是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音乐家。他参加慈善公益活动，创立自己的基金会，让更多似乎远离了世界的人走近音乐。现在的他多了一个身份，“郎朗老师”，他想通过自己的经验，影响更多的年轻人。遇到不太明白的学生，他就使出浑身解数，让他们感受音乐一切的变化，让他们感受到色彩，带着他们“像陪练一个交响乐团”一样去弹琴。

作为一个走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国钢琴家，郎朗也不断地尝试在国外演奏中国的曲子。虽然现在国外对中国音乐的接受度还限于小品，离整场的音乐会还有距离，但是郎朗在用西方的演绎方法诠释中国音乐，通过和谭盾等人的合作，逐步地让更多的西方听众听到了来自中国的声音。“反正我才30岁，还可以弹好几十年！”

郎朗一直说，自己实现梦想的路径是Step By Step。“走完一步走下一步，它会有一个跳跃，它这个自然就会跳的。就像玩儿游戏给你加分，晋级到了下一轮，都是不知不觉中的。”一心想着走很稳的路，郎朗很多的跳跃，或者飞跃，就自然地发生了。他知道没有捷径可走，也清楚想要走捷径可能的代价，所以他坚持不着急地按着自己的节奏一步一步来。他说自己不是个爱冒险的人，但是保持着“能发现并积极调整”的状态，永远在追求新的弹法，追求新的处事方式。

由内向外发生的作用，音乐上的冲动，是郎朗生活的中心和基础，也是他的梦想一步一步走得更远的力量。现在，他带着自己音乐梦想的光亮，走到更多更大的舞台上，走到更多梦想追求者的身边，影响着他们，带去更多的光和热，影响着更多的人去努力实现一个可以改变世界的梦想。

（综合《风尚志》、《南方人物周刊》报道）

神州

好的知识分子像啄木鸟，啄出虫子而保持树和整个森林的健康，而不是像喜鹊，说好话而对森林的健康无益。

——清华教授易延友一句“强奸陪酒女危害小”的言论引起热议，**白岩松**予以批驳。

国产电影的创作班底越来越年轻化，但他们的内容源依然单调，这个跟中国电影限制比较多也有关系。

——华谊兄弟总裁**王中磊**表示。

“语不惊人死不休”是种微博病，有人身患此病还不自知。这病必须治，如不治，害己害人害微博。

——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这样认为。

今日的批评家制造出了青春文学，真正能够成大器的必是那些跳出了这个范畴的人，他们不以别的青春写手为对手，而以心目中的大师为对手，不计成败地走在自己的写作之路上。

——作家**周国平**这样评价青春文学。

有一类人是无知者无畏，他们没有历史观，不认为历史是有框架、有高度的，所以就会很轻易地冲出这个框架，就敢在瓷器上写个黄帝、炎帝，这不单单是指冀宝斋。

——收藏家**马未都**针对“冀宝斋博物馆”事件，提出建博物馆不能“无知无畏”。

非常好声音

电影界充满了投机主义心态，忽视创作，重视营销，把电影塑造成这个时代最优质消费品的同时，也为未来的发展埋下危机。

——影评人**王沐**表达了对于电影界高票房下的隐忧。

（李婷婷辑）

周令钊 讲述经典背后的故事

强晓玲

“他搞了许多重大的事情，但他从不张扬。”著名画家黄永玉提起自己的老同事、老朋友周令钊更多的是佩服。

尽管一生知名、经典作品无数，先后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版画系、壁画系教授的他，更愿意把自己看成一个作画的人，“绘画，是我一生的爱好与追求。”如今已经94岁的周令钊说。尽管，他被誉为“国家形象设计师”。

开国大典前夜赶制毛主席画像

被誉为“国家形象设计师”的周令钊，在当年中央美术学院有着构思快、动作快的“快手周”称号，这与他很小就参与了众多实用美术创作不无关系。

1919年生于湖南平江的周令钊，在长沙读小学时，就被老师绘制挂在校门口的马克思、恩格斯等肖像所吸引，8岁的周令钊在研究一根根“卷曲大胡子”的画法时也被当时进步的革命气氛所吸引。14岁在长沙美专学习期间，就已经在长沙的国货公司做广告设计来贴补家用。1938年9月，周令钊参加了全国首幅巨型抗战作品黄鹤楼壁画《全民抗战》的创作。再后来他参加了抗敌演剧队，做舞台美术设计、画演出海报等。

天赋与勤奋，“早熟”的经历，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成立之时，让年轻的周令钊得以承担了许多重要的国家任务。

1949年开国大典前，绘制毛主席巨幅画像的任务落在了中央美术学院年轻教员周令钊身上。接到任务时，距离开国大典只有20多天的时间了。周令钊带着新婚妻子陈若菊，登上了搭建在天安门城楼东侧的大型画架。这一干就是十几天，画像绘制接近尾声时，聂荣臻元帅亲临现场，“像，非常像!”聂帅的话让周令钊吃了定心丸。不过聂帅在离开时也提出了一个改进要求，画像原型出自当年新华社摄影师郑景康在延安时期给毛主席拍摄的照片，“照片中主席的风纪扣开着，显得很洒脱。”画像绘制中,周令钊并没有刻意修改。交换意见中，聂帅觉得“主席的风纪扣还是系上好”。

绘制修改的画像完美收工已是开国大典前夜，夫妻俩拖着疲惫身子回到住所已经很晚，而就在这时，天安门又来人接周令钊了。原来刚刚挂妥在城楼上的主席像下面“为人民服务”的一行字在画像上显得不太和谐，远处看又小又花，周总理的意见是“马上改”。

天安门城楼中间门洞约8米高，主席的画像就悬挂在上面，涂改巨幅画像上的几个字谈何容易。“当时设备非常简陋，没有升降机。”在三个直梯绑成的巨型长梯上，所有聚光灯打向城楼，周令钊一手拿照片、调色板，一手握画笔，再一次爬到了巨幅画像前。

梯子挪动十几次，上上下下几十次。涂改了文字，添加了衣扣，满意收工天已大亮，此时距开国大典就剩几个小时。

那一年，周令钊30岁。

参与多项重要设计工作

多面手的周令钊在刚刚完成开国大典毛主席画像绘制后，不敢停歇，一些重要的设计工作都在等着他。

那时的北京还没有大会堂，一些国家级会议经常会在中央美院的礼堂进行，布置会场的重任就落在实用美术系的老师和同学们身上。1949年在布置团代会会场时，周令钊结识了团中央《中国青年》杂志美术编辑娄霜，在那之后的一天，娄霜又找到周令钊，请他帮忙设计一稿“共青团团旗”方案。

“全国各族青年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刚听完娄霜关于团旗理念的介绍，“一颗被一个圆圈环绕的五角星”就出现在周令钊面前的稿纸上……

“同意此式”，毛主席在提交来的征集稿中选出周令钊的设计方案并批示道。周总理和刘少奇对此案也都表示满意。作为珍贵档案，去年“五四”青年节前，团中央的同志特将此档案批示及设计方案复印件登门送给周令钊。时隔60余年，还能再见自己的设计图，周老备感欣慰。

其后，“星星火炬”，一代代中国人铭记的少先队队旗也在周令钊参与下诞生了。

1950年，周令钊作为中央美术学院小组成员和张仃、张光宇，与以梁思成为代表的清华大学小组共同完成了国家形象中最重要的徽标——国徽的设计工作。“国徽的设计是一个集体创作”，过去周令钊曾多次解释过。

而他担任总体设计的人民币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还有部分票面我们仍在沿用。“人民币第一套是在延安时期设计的，第二、三、四套都是我直接参与设计的。”周令钊说。

从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悬挂的毛主席画像、新中国国徽，到共青团团旗、少先队队旗和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这些都是周令钊绘画设计和参与设计的作品。为此，他被誉为“国家形象设计师”。

2011年，92岁的周令钊为创作大型壁画《长沙——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作墨稿。**周 容**摄

1949年，周令钊与夫人陈若菊合作的毛主席画像。

最怕别人称他“艺术家”

提起自己的创作往事，周令钊总是感谢自己的工作。他的作品生动简洁、线条流畅，“没有基础的素材搜集，是不会创作出大众喜爱的作品的。”为了储备各种艺术创作素材，周令钊每年都会挤出大量时间深入到基层、少数民族地区采风写生。

“他涉猎了难以想象的广泛而多样的领域，完成难以计数的艺术创作，都能达到至精至善。”著名画家侯一民对周令钊的评价更多来自对其艺术人生的敬仰。

的确，除了众多的实用美术设计，新中国成立初期周令钊创作的大型历史油画《五四运动》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和展览，他的油画作品《韶山》收藏于全国政协礼堂。

自1938年参与黄鹤楼大型壁画《全民抗战》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周令钊和夫人陈若菊在全国各地创作了众多壁画作品。国家博物馆的大型壁画《世界人民大团结》、人民大会堂湖南厅的湘绣大挂屏《韶山》画稿、为《人民日报》社作丙烯壁画《青罗碧玉》、北京饭店的《古都集翠》刻漆壁画、为武汉黄鹤楼作陶板壁画《白云黄鹤》……他的壁画生涯至今75年。

采访中，94岁高龄、身康体健的周令钊最怕听到别人称他为艺术家。“人家说我是画家，我只认为自己是教员，是老师。”